

## 复刊《民报》

1913年11月11日，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民报》经过短期的筹备以后，在东京秘密复刊。复刊后的《民报》伪称在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际上仍在日本印刷，“秘密妥慎按期奉寄”给订户。复刊后各期的编号和停刊前的相衔接，同年12月出至第二十六期后停刊，这是《民报》出版的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阶段《民报》的总编辑是汪精卫，协助他撰稿的有胡汉民、易本羲、杜学衡等人，大部分稿件都出于汪、胡两人之手。

汪精卫当时刚刚从南洋群岛回到日本。他以早期为《民报》所写的那些和《新民丛报》论战的文章而名噪一时，也因此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窃据了《民报》主编的宝座。但是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混在革命队伍内的投机者。早在1912年，当他在法政大学速成科担任班长的时候，就曾经将同班同学参加革命组织的情况向清政府驻日大使杨枢告密。同年，留日学生为反对“取缔规则”发动罢课，他却力主妥协，并曾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担任复刊后的《民报》主编后，他先后写作了《续刊辞》、《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等文，装出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姿态，表示“革命之实行一日未底于成功，则不可不鼓舞其百折不挠之精神，使蹶者起，起者趋，锲而不舍，进而不已，以底于成之日。”他实际上对革命的前途早已失去信心。没有多久，他就放下报纸不管，跑回国内孤注一掷地谋刺摄政王去了。

《民报》复刊后，只出版了两期，历时两个多月，就因为主编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人的出走而停刊。同盟会创办的这一同盟会的言论总机关,在经历了前后十年的战斗历程以后,终于最后结束了。

一年以后,当武昌起义的准备活动正在秘密进行的时候,同盟会方面曾经一度筹备将《民报》迁至南洋一带恢复出版。到1911年12月为止,在旧金山、河内、仰光、棉兰、吡叻、槟榔屿等地华侨中募集到的该报复刊经费已达1.2万元,聘定的撰述人员也陆续向槟榔屿集中,就在这个时候,震动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报》复刊的事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民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讲坛,在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打退改良派的猖狂进攻,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等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它教育了那一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武装了他们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最爱读的革命刊物之一。但是,《民报》的宣传是有缺陷的,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总机关报,它的作用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关键在于缺少一个能够坚持孙中山革命路线的有力的编辑部的领导班子。孙中山总括全局,经常奔走于南洋、欧、美各地,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自始至终地亲自过问报纸的一切事务。朱执信、廖仲恺等同盟会的左派骨干力量,又忙于国内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办报上。《民报》的编辑领导工作就自然地落在了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头上,而以章太炎主持的时间为最长。他们各自主观上的缺点,对《民报》都有影响,而同盟会内部的一些矛盾,在这个报纸上也经常有所反映。这是这个重要的革命机关报在宣传上存在着很大缺陷的一个主要原因。

## 圆摇英国与不丹《普那卡条约》

不丹王国位于亚洲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南坡。西北同中国西藏，南同印度接壤。居民愿豫为不丹族，其余为定居不丹的尼泊尔人。多信喇嘛教噶峰派。

不丹境内多山，北部高山终年积雪，中部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宜于耕种，南部沿喜马拉雅山山麓地区气候湿热，土地肥沃。

不丹为历史悠久的古国，愿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入侵不丹。愿缘年愿月，不丹同英国签订《辛楚拉条约》，强迫不丹割让包括噶伦堡在内的第斯泰河以东地方。作为世袭的君主国，不丹国王为最高统治者兼陆军总司令，拥有最高司法权力，包括受理最高上诉案件。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大臣会议是行政机构，国王兼任政府首脑。皇家咨询会议为最高监察机构，并对日常工作起咨询作用，有权仲裁各部之间的纠纷。

愿园年愿月愿日，不丹的各首领、头人、喇嘛等聚会商计，一致拥立原通萨地区长官，德布职位（管理国家的最高职位）竞争者中最有势力的首领乌颜·旺楚克为不丹第一任世袭国王，并宣布竺加布为世袭称号。在此之前，不丹实行沙布隆（相当于印度的“法王”）体制，沙布隆为不丹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首领，只有喇嘛才能担任高官显职，他们的力量大大超过名义上的统治者，内战频繁。不丹世袭君主国的建立，结束了不丹近猿园年的神治国历史，加强了中央政权。愿月愿日为不丹国庆日。

《普那卡条约》是对愿缘年《辛楚拉条约》的修订。根据愿缘年条约第愿条，不丹同意把不丹与库奇比哈尔和锡金之间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的一切争端交由英属印度政府仲裁,并接受英印政府所作的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不丹,英国于1865年11月18日强迫不丹在普那卡签署了新条约。按照修订的条约,不丹政府同意“在对外关系上接受英国的指导”。英国政府保证不干涉不丹内政。条约还规定把英国政府给不丹政府的津贴从10万卢比增为15万卢比。不丹政府将毗邻兰格普尔、库奇比哈尔和阿萨姆等地区的称为十八山口的地段割让给英印政府。这项条约使不丹丧失了对外主权,实际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185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实际上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不丹的统治。1885年11月18日,不丹竺加布吉格梅·旺楚克在大吉岭与印度签订了一项包括12款的《不丹—印度友好条约》。条约同意不丹“在对外事务上接受印度政府的指导”,印度则保证不干涉不丹的内政。只有印度政府有权向别国政府提出有关不丹对外关系的问题。印度还答应每年付给不丹10万卢比的补助金,并归还印占不丹的100平方英里土地。此外还规定不丹在印度政府的同意和协助下,从印度或通过印度免税进口武器、弹药、机器等。不丹则保证不向其他任何国家输出这一类物资。印度通过此条约对不丹的控制引起不丹政府和人民的日益不满。近年来,不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修改该条约。

## 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新学科

1904年11月10日，清政府准学部所奏，在京师大学堂设立11个新学科，即经科、法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商科、工科、医科，除经科外，其余均为第一次设立的学科。学部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筹办要点为：（一）步骤。除医科须俟监督屈永秋到堂，再行妥筹办理外，其余各科分门择要先设；（二）职员编制。每科监督之下，均设教务、庶务等提调管理。现科目尚未全设，教务或两科设1人，或以监督兼任。农科设于望海楼，设试验场委员1人。（三）教员编制。设中外教员教授各科。其中经科1人，法政科1人，文科1人，格致科1人，工科1人，农科、商科各1人，又随意科酌设教员数人，以足敷教授为限。（四）生源。现在预备科不敷分布，优级师范及译学馆毕业学习愿意就读者，自应分别考选。（五）校舍。因德胜门校址正待修建，暂于内城马神庙大学堂，略加扩充，先行开办。学部还建议，中国独有的经科，应准外国人入学肄业。清政府亦允准。

### 源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

清廷推行预备立宪以来,各省咨议局先后成立。1908年 11月 15日,各省咨议局代表由直隶议员孙洪伊率领,抵达北京,请速开国会。通称第一次国会请愿。

请愿前夕, 15日,代表们召开谈话会,议决进行次序,决定有代表进京之省在请愿书上均列代表姓名,无代表之省叙明人数。列名的共有 17省,为直隶、奉天、吉林、江苏、山东、河南、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山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其中后 7省未派赴京代表。安徽、江西、山西、河南代表略有变动。与此同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派密友、原政闻社常务员徐佛苏赴北京,参与这次请愿活动。

是日,代表们列队齐赴都察院,递呈请愿书。请愿书中说,现时“时局阽危,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速开国会已刻不容缓。理由是:首先,内政改革,必须速开国会。认为,“内政之改革,视乎机关之善不善”,“机关一日未善,则政令一日不得实行,九年筹备之事,一切待等诸具文”。而现时政治机关,“畛域各分,十部不相统一也;上下相诤,地方官无可执行也”,由于“机关”不完善,方针不确定,“虽有忠尽之臣,勤敏之士,无以尽其职而期其功也”。因此,九年预备立宪无论“以程度论”,还是“以时机言”,都不可能实现内政改革,实行新的宪政,只能是“徒虚掷此九年岁月而已。”即便有一个略似国会之资政院,也“绝不见有责任之政府”,政府没有责任,则资政院无能为力。国会与此截然不同,“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都;有国会,然后政府乃有催促

之机，庶政始更张之本”。请愿书指出：“欲督促政治之统一，振起国民之精神”，内政机关改革“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没有必要再行九年预备立宪。请愿书还认为，改革内政离不开财政，要克服目前国家极端困难的财政问题，“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这就务必速开国会以为筹划。其次，从外交方面考虑，中国必须速开国会。自中国与外国有交涉以来，由于政府采取秘密政策，操纵失策，结果“势成积弱”，不是“蹙地”，便是“负债”，“政府受困于上，国民不满于下”。而有国会，“则对于全国，为政府交通之邮，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做到“下上相通，猜疑自泯”，以保东亚和平之局。如待至九年，“患机叵测”，“外交必更颠危，民怨必更剧烈。”再者，如果不速开国会，空言九年立宪，在此内外交困，上下未通之时，皇室“内无可以表彰尊亲之宜，外无可以代负人民之责”，必将引起人民的怨恨，非常危险。若开国会，就可以成立责任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荣”。因此，在这岌岌可危之日，图国之根本大计，“宜速开国会也”。请愿书还驳斥不能轻易更改九年预备立宪之旨和人民程度不及的两种论调。指出，“先朝必已国会为必当开”，现在早开国会，不过是对先朝“继志述事”罢了；说人民程度“必试之而后见，不试之而强抑之”，完全是冤枉人民。其实人民程度从各省咨议局的召开“既已小试之矣”，完全达到了速开国会的要求。请愿书要求清政府立即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在一年内召集国会。

同日，京师学界万余人召开筹还国债会，并欢迎代表。

次日，请愿代表集议今后的行动办法，决定利用都察院代奏前这段时间，遍谒军机大臣，游说他们赞成速开国会，并公推孙洪伊、刘崇佑、谷芝瑞、陈登山、陶熔、方还为代表，前往晋谒，并将请愿副本分送各王公大臣。

次日，京师商绅学界复开大会欢迎请愿代表，孙洪伊、陶熔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等出席大会，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闻者至于痛哭流涕。

○原日，代表们谒见军机大臣，谓我国正在实行宪政，必须速开国会。奕劻、那桐表示赞成。鹿传霖不知道为何开国会，代表详为解释，“仍不得要领”。戴鸿慈说“法律尚未完备，宪政甚多窒碍”，不宜速开国会。

○原日，请愿代表在京师昆新会馆集会，决定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同时决定暂时以京师代表团为开会总部。会议要求各省从速成立“速开国会同志会”分会，举定干事，“俾得三四月间举员到京，再上请愿书，庶几民心一致，易回君听”。并议订组织《规约》，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者均为会员，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会员皆有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以促国会成立之责，每省置干事源人以上，担任通告本省会员并与别省通信之事，干事由各省推定，未推定之前，暂由到沪、到京代表任之，新会员加入，由本省干事或会员介绍，通讯总机关设于上海，由江苏等省干事在上海者经理其事，所需经费由各省会员分担，每省至少每年交百元以上，半交总机关，半交本省干事。

○原日，代表们再谒军机大臣世续。世续怀疑“国民有二心”。代表们回答：“二心则无之，倘国家空言筹备，不早开国会，与人民相见以心，则自今以往，未可知也。”

○原日，在京代表通告各省咨议局，说现在已于北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以求合力进达之道”，盼联合同志，同时并起，“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

同一天，京师○原日，八旗士民聚集振华学校开会，推举文耀、恒钧等为请愿代表。

○原日，代表谒见肃亲王伦贝子、载泽，均辞不见。又谒载涛、载朗。载涛说，“极望国会早开，庶几可挽危局”，载朗表示“定当竭力相助”。

○原日，请愿代表谒见资政院总裁溥伦。溥伦认为，“资政院

与国会无异,何必急开国会?”又说“如果奉旨准开国会,我亦甚愿”。

同日,文耀将八旗士民请愿书送呈都察院。请愿书说,“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振积弱之势而立图国之本”。从“国势之关系”看,现时国势危殆,吏治日疏,权利尽失,“百孔千疮,不堪逼视”,若不速开国会,“则人进我退,人取我与,再过数年,国势恐更不及今日”;从“民力之关系”看,自通商以来,外债累数万万,政府不得已取之于民,“赋敛繁兴,搜括备至”,加上天灾人祸,生产荒芜,致使人民之力“坐受数敝,民力盖将绝矣”,若不速开国会,以培养民气,一切将无以为继,“此国会之关于民力,不可不速开也”。特别是,有了国会,“则朝廷益尊,皇基愈固,治平之盛,垂于永久,圣德之美,偏敷于中外,为古今所罕遇也”。请愿书要求终止九年预备立宪,在一年内速开国会,“上以终先朝未竟之志,下以慰亿兆望治之心”。

都察院接到孙洪伊、文耀分呈的两份请愿书,都堂官张英麟打算先探军机大臣意向,再作处理,不肯立即代奏。大多数御史“力言此次各省代表来都要求速开国会,邀准与否,实为大局存亡、民气消长之所关,亦即列强对待中国用刚用柔我侮我之所系”,“际此紧要关键,正宜联名具奏,极力赞成,以期襄斯盛举”。直隶总督陈夔龙、两广总督袁树勋、山东巡抚孙宝琦、奉天巡抚程德全等,及出使各国大臣,也都先后致电政府,“请俯从舆论,速开国会”。同日,都察院将两份请愿书上奏朝廷。

同日,清政府颁布诏谕,说:请愿代表“具见爱国愀忱,朝廷深为嘉悦。”“惟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总之,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现在各省咨议局均已举行,明年资政院亦即开办,所以为议院基础者,具在于此”。全体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臣民”毋骛虚名而隳实效”。“兹特明白宣示：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这样，清廷拒绝了请愿代表速开国会要求。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

## 缘起中国地学会与《地学杂志》

《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的会刊。于1909年11月在天津创刊，1910年随中国地学会迁至北京出版。1917年停刊，前后共18年，实际上只有15年出杂志，有三年因故停刊。开始时，每年出4期，后改为6期，最后改为8期，总共印行156期。《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的机关刊物，是我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文献。1909年张相文约同在天津的地理教师、教育界人士及行政官员二十余人，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会——中国地学会。张相文任会长，白毓昆任编辑部长，他二人也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白毓昆在1911年滦州起义中英勇就义。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该会总理（后改总裁），章鸿钊任干事长。

在创刊号上阐明的办学会目的说：“案查东西各国学问进步之速，不徒恃在上者悉力维持，实由下之业此者分途致功，每遇困难学科，辄自立学会，广招同志，共矢研究，故能交广见闻，拓张知识，其新理新器，日出不穷，半多由此。”“今与海内诸君子约，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借收增壤益流之效。”他们提出的编辑方针是：“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搜罗故实，博采新闻，其目的则注重于民生之消长，物产之盈虚，疆圉之沿革。”栏目分：图迹、论丛、杂俎、说郭、邮筒、本会纪事、图书介绍等。《地学杂志》刊登最多的是经济地理方面的文章，其中以水利、交通、物产为重点。政治地理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关于行政区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域的建置和划分,边界问题占了很大比重,如邹代钧遗作《中俄边界记》中记载了中俄边界变迁史,用事实揭露了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占。人口地理方面主要是人口资料和人口迁移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种和民族,风俗和宗教,以及文化地理、都市地理和军事地理的文章等。同以上人文地理相比,自然地理的文章少一些,主要是关于气象气候、地形、水文方面的文章。此外杂志还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考察探险的文章。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进行多次实地调查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大梁访碑记》《长城考》《河套与治河之关系》《成吉思汗园寝之发现》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都有一定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地学杂志》和《地质杂志》创刊前登载了不少地质学文章。例如我国地质学的先驱者之一章鸿钊在担任中国地学会干事长时,在该刊发表了多篇关于地质学方面的文章,如《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地质调查咨文》《矿床浅说》《黄龙洞生成观》《中国石油考略》等。中国地学会曾和中华书局合作,计划编辑一部包括县、省以至全国地理志的《大中华地理志》。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庞大计划未能实现。《地学杂志》很重视地图,常在卷首刊登各种地质图、地貌图、行政区划图等。该刊初期还刊载《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气象观测说》《论导淮》《中国之铁矿》《湘皖水灾调查报告》《论地质之构造与地表之变动》《抛中国火山眼》《论新疆边防》《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地学杂志》在提倡和推动我国地理学研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在传播、普及现代地理知识上做出了贡献。

## 遥指虎丘集会显胸怀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1909年成立，1911年结束，先后入社者达千人以上，遍布全国各地。其《南社丛刊》是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

《南社丛刊》1909年创刊，不定期出版，到南社结束时，共出10集。该刊规定只刊登社员作品，分诗、文、词三部分。经费依靠社费收入和社员捐助，出版后免费赠送社员，多余部分对外发售。前期的作者多数是同盟会员，黄兴、宋教仁等都有诗作发表。辛亥革命后以提倡国学为主。

南社创建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陈去病1904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曾参加编辑《江苏》杂志。次年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创办《警钟日报》，又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1911年两刊被清政府查禁，陈去病在上海、杭州、汕头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高旭1904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次年回国，担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在上海建立了分会机关——夏寓，并创办健行公学，培养革命力量。1911年受到清政府监视，遂撤除机关，关闭学校，隐蔽于金山故乡。柳亚子1904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在章太炎、邹容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1911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创办《复报》，意在光复中华。《复报》停刊后回吴江故乡。

陈、高、柳共建南社，在虎丘举行的第一次雅集上制定条例，商定出版《南社丛刊》，推选出首届编辑员陈去病、高旭、庞树柏三人。第1集1911年元月出版，1911年1月1日开线装本。陈去病的发刊词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南社诗文词选叙》指出：“自古羁人、贬官、寡妇、逋臣、才子、狂生、遗民、逸士，苟其遭逢辐辏，侘傺穷途，志屈难伸，身存若殁，莫不寄托豪素，抒写心情。……南社之作，得毋类欤！然而语长心重，本非无疾以呻吟，兴往情来，毕竟伤时而涕泣。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表达了南社成员在民族危亡之际，忧国忧时的心情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胸怀。

第圆集出版后，柳亚子对员圆集的编辑体例感到不满，于是在南社第猿次雅集上提出修改条例的建议，陈去病和高旭都未出席。修改条例规定按诗、文、词分类编排，每集诗、文各源页，词录圆页。改选景耀月、宁调元、王钟麒为编辑员，但均未到任。第猿源集由柳亚子、俞剑华代编。第源集出版后又改选宋教仁、景耀月、王西神为编辑员，仍未到任。第缘苑集由柳亚子一人代编。

鉴于两次编辑员都未到任，远集出版后，柳亚子再次提议修改条例，改编辑员猿人制为员人制，并自荐担任。此建议先遭高旭反对，又在南社第苑次雅集上被否定。柳亚子一气之下，于员圆年员月在《民立报》宣布“自请出社”。由于缺乏主持人，各项活动难以展开，于是书记员姚石子和庶务员朱少屏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柳亚子的建议，请其复社。随即重订南社条例，规定设南社主任一人，总揽社务，主任由社员投票选举产生。员圆年缘月柳亚子复社，并当选主任，主持编辑工作。同年下半年，编辑出版第怨京集，并刊登南社雅集和临时雅集的摄影及北京、长沙等地分社雅集摄影。

员圆年，南社发生唐宋诗之争。柳亚子代表尊唐派，得到陈去病、吴虞等的支持。尊宋派由推崇“同光体”的姚鹓雏、傅屯良、成舍我、闻宥、蔡守等组成。柳亚子厌恶以清末遗老陈三立、郑孝胥为首的“同光体”诗派，反对尊宋。双方论战达一个多月，最后柳亚子将闻宥和成舍我两人开除出南社。蔡守盗用广东分

## 1904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社的名义发布告,要另选南社主任。蔡的分裂活动遭到大多数社员反对,柳亚子仍然当选为主任。但是他看到社内思想出现如此分歧,组织也开始涣散,靠个人努力无法挽回,遂于1905年辞去主任职务。1905年第10集出版,由傅屯良编辑。1906年曹锟贿选总统,南社中有13名国会议员受贿,包括高旭。此事遭到全社会的唾弃,南社名誉扫地。是年10月第11集由陈去病、余十眉编辑出版,随即停刊。

南社建立之后,以文学活动为掩护,联络知识分子,培植爱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陈去病曾说过“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该刊也是同盟会的宣传阵地之一,从各个方面进行反清革命宣传。

1907年,江浙两省兴起反对清政府出卖国家权益,保卫沪杭甬铁路权的斗争。高旭作《路亡国亡歌》:“诸公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二十世纪大恐怖,疾雷掩耳不及防。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抑何肺肝自压抑之自聩瞽之取天札,开门揖盗礼意将。偌大利权自放弃,不啻赠作陆军屯驻场。……千年睡狮或者一朝醒,狂呼大啸起搏击。危哉诸公何不思,梁亡鱼烂今其时。若不转还大祸至,磨刀砺剑争来问罪危乎危。”当时同盟会员经常采用唱词韵文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

“丛刻”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作品形式多样。有一首讽刺诗形象地刻划了清朝官吏对外国人奴颜卑膝的丑态:“既非显长官,又非名太史,鹭岸入官衙,门状片白纸。放炮开中门,笋舆竟进里,直抵花厅口,恭讶如星使。下舆一握手,何曾与半跽,急急延上座,倾耳听辞首。……借问此何人,闻道一亡士。主人礼何隆,因佗外国士。”(蔡寅《既非显长官》)1904年长沙饥民抢米事件发生后,社员郑泽写了《湖南民变纪略》,记录了事变的经过,揭露湖南巡抚残害百姓和镇压饥民的罪行。

摄影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除了揭露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清朝统治的腐败与残暴以外,《南社丛刊》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号召为民族革命献身。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该刊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南社成员以充满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的诗文,来鼓舞反清革命的士气。“铁血世界仗强力,文字虽工究奚益,生当掷笔取封侯,上马提刀去杀贼。高生歌泣真无聊,俞生尔亦人中豪,冷落人间两宝剑,匣中狂吼时未遭。两剑未知孰利钝,他年谁竟除腥臊。……”宋教仁漂泊海外,思念祖国时写道:“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流露出革命志士对于国家民族深切的热爱。

在辛亥革命中,不少南社成员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反清武装斗争,投笔从戎,请缨杀敌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张光厚《中秋》诗有云:“胡马蛮刀逼汴梁,金辽妖气太披猖。如何台阁皆朱子,不见汤阴出岳王。侠气成虹临易水,乱民如鲫起芒砀。萧郎三十今将到,准备干戈扫战场。”周实丹烈士生前写道:“腥风血雨误归期,痛哭江头杜拾遗。弩末已无穿縠力,刀头休作赐环思。狰狞猛虎磨牙日,夭矫神龙见首时。虏运将衰炎运在,南阳会睹汉旌旗。”作品充满了民族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长期斗争中,有无数志士仁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前人以鲜血和生命,激励后来者的斗志。丛刊有许多悼念烈士的诗文,广为流传,教育后人。

在1906年发生的苏报案中,邹容牺牲于帝国主义租界的监狱里。邓家彦写了《吊邹容》一诗:“天道今如此,邹生可大哀,鸿文沟满汉,壮志军风雷。黑狱鹃魂泪,青山侠骨灰,只今遗憾在,王气未全摧。”1907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雷铁崖哭道:“誓抵黄龙聚义兵,复仇匪羨帝王名。却怜鹿鹿干戈起,辜负昆阳雷雨声。子弟八千殉项羽,英雄五百死田横。胡儿漫喜根株尽,得遇春风草又生。”这些诗文的作者,都是同盟会员,与烈士

有同样的情怀,因此在悼念诗文中悲痛感情显得更加真切和强烈。人们从这些诗文中可以感受到复仇的决心和无畏的献身精神。

南社学术上提倡国学,旨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的精华,反对清朝末年为清朝统治者涂脂抹粉,麻痹人民斗志的没落学术风气。南社成员提出的文学主张,也都贯彻这个精神。高旭《答胡寄尘书》曾指出:“盖满清一代所谓学士文人,大半依附末光,戕贼性灵,拜扬虏廷,恬不知羞,虽有雄文,已无当于大雅。”在辛亥时期,许多南社成员提出文学应该为社会政治服务,提倡继承明末复社、几社的民族主义精神,唤起民众,建立爱国主义文学。高旭提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盖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然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已,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如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皆所谓止乎礼义而未尝过也。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他为旧体诗词标准加上了资本主义的新内容,主张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在这一文学思想主导下,青年时代的高旭曾尝试于诗词的改革,运用白话,还大量引用从欧洲传入的新名词,创作出一些新颖奔放的诗。但是他没有坚持这种尝试性的实践,陈旧的传统观念对于清末知识分子思想的束缚是很顽固的。高旭在写改良新诗的同时,又不愿意完全抛弃旧文体,他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因此高旭的文学思想中一直有着自相矛盾的成分。这种思想也反映了南社初期部分社员在文学革命这个问题上立场观念的模糊。民国建立后,南社中部分成员在政治上开始消沉,文学思想也趋向保守。高旭也是这